

點注唐宋八大家文讀本

蘇洵 蘇軾 蘇轍

【清】沈德潛 選評

【日】川上廣樹 纂評 魯林華 點校



江苏人民出版社

點注唐宋八大家文讀本

蘇洵 蘇軾 蘇轍

【清】沈德潛 選評

【日】川上廣樹 纂評 魯林華 點校



江苏人民出版社

作者簡介

魯林華 湖北孝感人，浙江海洋大學副教授，著有《先秦諸子這些人》，點校《經訓比義》，參與編撰著作多種。

责任编辑 / 张 凉

责任校对 / 张雅静

版式设计 / 大春传媒

內容簡介

此為海外漢學，國內不易見到。唐宋八大家是中國歷史上最為人關注的文學團體。明清以來有記載的各種選本有十七種左右。其中影響最大的是茅坤、沈德潛與張伯行的選本。川上廣樹的《點註唐宋八家文讀本》增評本，既充分吸收了漢學研究成果，展示出深厚的漢學造詣，表現了日本江戶文化與中國傳統文化的深厚淵源，同時他又能自出機杼，站在特定的場景下對唐宋八大家進行解讀，並通過這些解讀寄托他的情感、思想與情緒，表現出獨特的視野與思維方式。

點校說明

唐宋八大家，指的是唐代的韓愈、柳宗元與宋代的歐陽脩、蘇洵、曾鞏、王安石、蘇軾、蘇轍這八位優秀的散文大家。這一名號的出現，一般歸功於茅坤（1512～1601）所編選的《唐宋八大家文鈔》。《文鈔》問世之後，八家之說逐漸為人們所接受，此後雖然不斷有人提出質疑，如：為何偏偏是八家而不是七家或九家，為何唐獨取兩家而宋有六家之多，為何蘇氏父子三人能佔取宋代一半的名額等。其中，態度最為激烈的是清代大才子袁枚，他甚至質疑茅坤是否翻閱過唐宋兩朝的文章：

“凡類其人而名之者，一時之稱也。如周有八士，舜有五人，漢有三傑，唐有四子是也，未有敢千百世之人而強合之為一隊也。有之者，自鹿門八家之目始。明代門戶之習，始於國事而終於詩文，故於詩則分唐、宋，分盛、中、晚，於古文又分為八，皆好事者之為也，不可以為定稱也。夫文莫盛于唐，僅占其二；文亦莫盛于宋，蘇占其三。鹿門當日其果取兩朝文而博觀之乎？抑亦就所見者而撮合之乎？且所謂一家者，謂其蹊徑之各異也。三蘇之文如出一手，固不得判而為三。曾問平純，如大軒駢骨，連綴不得斷，實開南宋理學一門，又安得與半山、六一較伯仲乎？”（袁枚《書茅氏八家文選》）

無論在袁枚看來這八家的並稱有多麼不合理，唐宋八大家之說終究深入骨髓，牢不可破。明清以來人們學習古文，也往往以唐宋八大家為模仿對象。“善學文者，其始必用力於八家，而後得其所從入其中”（劉開《與阮芸台宮保論文書》）。不僅寫作古文要以八大家為不遷之宗，寫作時文也不能例外。“為古文而不源於八家，支離鬼瑣，其失也俗；為今時文而不出於八家，膚淺纖弱，其失也庸”（杭世駿《古文百篇序》）。總之，離開了八大家，也就意味著拋棄了中國文章的傳統與精髓：

“六經、四子皆載道之文，而不可以文言也。漢興，賈誼、董仲舒、司馬遷、

相如、劉嚮、揚雄之徒，始以文名，猶未有文家之號。唐韓氏、柳氏出，世乃畀以斯稱。明臨海朱右取宋歐、曾、王、蘇四家之文以輩韓、柳，合爲六家。歸安茅氏，又折而定之爲八。而後，此數人者，相望於上下千數百年，若舍是莫與爲伍。自是天下論文者，意有專屬，若舍數人，即無以繼賈、馬、劉、揚之業。夫自東漢以迄於明，其間學士詞人，蟻聚蜂屯，不可計數；一二名作，先後傳誦字內者，亦如流水之相續於大川。而其爲之數百十篇，沛然暢然，精光照人間，不可磨滅，則自韓、柳、歐、曾、王、蘇外，終莫得焉。”（戴均衡《重刻方望溪先生全集序》）

“唐宋八大家”這一稱號的深入人心，與茅坤所編《唐宋八大家文鈔》有關。《唐宋八大家文鈔》的影響力，《四庫總目提要》認爲是建立在它恰當的選文基礎之上：“然八家全集浩博，學者遍讀爲難，書肆選本又漏略過甚。坤所選錄，尚得煩簡之中。集中評語，雖所見未深，而亦足爲初學之門徑。一二百年以來家弦戶誦，固亦有由矣。”這一說法，現在看來是值得商榷的。八大家的文章尤其是歐、蘇等人，確實稱得上浩博，但茅坤的《文鈔》其實也算得上浩繁。《文鈔》計收入韓愈文十六卷、柳宗元文十二卷、歐陽脩文三十二卷附《五代史鈔》二十卷、王安石文十六卷、曾鞏文十卷、蘇洵文十卷、蘇軾文二十八卷、蘇轍文二十卷，全編總共長達一百六十四卷。這樣大的規模，並不適合作爲“初學的門徑”。

呂留良(1629~1683)之《晚村先生八家古文精選》，共計八卷一百八十五篇，選文精則精矣，卻失之簡約，如我們所熟知的《師說》《送董邵南序》《毛穎傳》《捕蛇者說》《三戒》《小石潭記》《喜雨亭記》《超然台記》《潮州韓文公廟碑》《六國論》《上樞密韓太尉書》《黃州快哉亭記》《寄歐陽舍人書》《墨池記》等，均未能入選。張伯行(1651~1725)之《唐宋八大家文鈔》選文計十九卷三百一十六篇，篇幅適中，但曾鞏之文選錄七卷一百二十八篇，超過全編三分之一，有失偏頗。選篇與評點均數上乘的，是沈德潛的《唐宋八家文讀本》。

沈德潛(1673~1769)，字確士，號歸愚，清代長洲縣人。乾隆四年(1739年)進士及第，歷任編脩、侍講學士、內閣學士、禮部侍郎等。著有《歸愚詩文鈔》六十四卷、《說詩晬語》二卷等，選編《古詩源》十四卷、《唐詩別裁集》二十卷、《明詩別裁集》十二卷、《國朝詩別裁集》三十二卷及《唐宋八家文讀本》三十卷等。其《唐宋八家文讀本》成於乾隆十五年(1750年)，前有作者自序及凡例十則，闡述選文宗旨與選本體例，並對八家之文做出總體評斷。文中以點圈提示佳句、警句，以夾批註釋音義訓詁，以眉批指示章法結構，以末評綜論

全文，間引茅坤、儲欣、金聖嘆、朱熹等人評語。

《唐宋八家文讀本》歷時數十載，三易其稿，精於採擇，嚴於考訂，在諸家選本中尤屬體例嚴整，格式完備。在所選八家三十卷計三百八十篇文中，卷一至卷六為韓愈文，卷七至卷九為柳宗元文，卷十至卷十四為歐陽脩文，卷十五至十七為蘇洵文，卷十八至二十四為蘇軾文，卷二十五至二十六為蘇轍文，卷二十七至卷二十八為曾鞏文，卷二十九至卷三十為王安石文。從作者而言，韓愈、蘇軾文章入選最多，歐陽脩次之，曾鞏最少，大致合乎今天人們對八家藝術水準的評定。

從文體範圍而言，韓愈文章入選最廣，奏議、論辯、序跋、書牘、贈序、雜記、傳狀、碑誌、哀祭等無所不有，柳宗元、蘇軾次之，蘇洵最少，大體符合八家創作實際狀況。從體裁而言，嚴守古文範疇，既無賦體之作，又無箴銘之類，如《凡例》云“賦為古詩之流，主文譎諫，卒歸於正。然既為韻語，則與散體文自別。雖前人選本有采入者，茲仍舍旃，論體裁也”。而茅坤《唐宋八大家文鈔》有賦六篇，王誌堅《古文讀編》有賦兩篇，儲欣《唐宋十大家全集錄》有賦十六篇，張伯行《唐宋八大家文鈔》、高塘《唐宋八家抄》各自有賦三篇。蔡方炳《八大家文選》雖無賦體作品，卻有箴銘文三篇。

從選評標準而言，沈德潛強調文道合一、詞理並重，態度相對更為平和中正。前此諸家衡文選篇，或偏于文法，或重於義理。偏于文法，不免墮入圈點勾勒，“一切誦讀，皆為舉業之資，選取八家下乘，橫空起議，照應鉤勒之篇，以為准的。小儒眯目，前邪後許，而精深閎茂，反在屏棄”（包世臣《再與楊季子論文書》）；格物窮理，輔時翼道，不得文人之趨，終淪為理學教科書，不得強行於天下。沈德潛並不諱言選本的實用功能，所謂“俾讀者視為入門軌塗，誌發軔也”（《唐宋八家文讀本序》），同時又希望“治經義者，有得於此”，藉以提升選本在當時人們心目的地位。

那麼，文與道如何統一呢？在序言中，沈德潛給予了唐宋八大家文章一個巧妙的定位，既肯定它們是載道之文，又承認它們醇駁相參。“文之與道為一者，理則天人性命，倫則君臣父子，治則禮樂刑政。欲稍損益而不得者，六經、四子是也；後此，宋五子庶能表章之；余如賈、董、匡、劉、馬、班，猶且醇駁相參，奈何于唐宋八家逆求其備乎？”這樣，表面上看降低了唐宋八家的地位，實際上卻給八家之文留下了合理存在的空間。“宋五子書，秋實也；唐宋八家之文，春華也。天下無驚春華而棄秋實者，亦即無舍春華而求秋實者。”載道之文與綺麗之文並行不悖，各有獨立的價值。雖然綺麗之文還只是載道之文

的延伸，但相對於格物窮理以接聖賢之心傳的唯一標準，還是一大進步。

從作家批評上看，沈德潛立場相對中允，不以人廢言。《凡例》開宗明義指出：“昌黎出入孟子，陶熔司馬子長，六朝後故爲文字中興。維時雄深雅健、力與之角者，柳州也。廬陵得力昌黎，上窺孟子。老泉之才，橫矯如龍蛇。東坡之才大，一瀉千里，純以氣勝。穎濱淳蓄淵涵。南豐深湛經術，又一變矣。要皆正人君子，維持文運。半山之文，純粹狠戾互見，芟而存之，勿以人廢言可也。讀八家，如見其學問、心術，並其所際之時事推論之，方不膚泛。”和歷來選家一樣，沈德潛對王安石頗多苛責，但他反復強調不能因人廢言，在具體品評過程中，也能充分肯定王安石作品的藝術成就。

從批點形式上，《讀本》也力求嚴而整。首先，對於文中掌故本事，“或錄爲總評，或列於旁批，俾讀者兩相證印”。如對《復仇狀》，題解有“元和六年，富平梁悅爲父報仇殺人，自投縣請罪。敕羣臣定議後，流配循州。見《舊唐書·憲宗紀》”，《釋言》題解有“《國語》‘驪姬使奄楚以環釋言’注‘以言自解釋也’，此二字所本”，均有助於讀者對文本的理解。在徵引過程中，沈又能提綱挈領，不誇多門靡、眩人耳目，使人一目了然。其次，對訛字訛音嚴加考訂，如《凡例》所引“中興”之誤“中與”“蒼黃”之誤“倉皇”“疑丞”之誤“凝丞”“閣下”之誤“閣下”“孤負”之誤“辜負”“刺刺從東，音七不能休”誤爲“刺刺從東，音辣”“汨汨從日，音聿然來矣”誤爲“汨汨從日，音骨”等等。至於文句舛誤，也嚴加辨析，如《爭臣論》“孔席不暇暖，而墨突不得黔”，沈氏注解：“本班固《答賓戲》，然《淮南子》雲：孔子無黔突，墨子無暖席。班用《淮南》語，而偶未之檢也。”同時，對生字僻詞易誤讀者，也一一標明四聲，真正發揮了《讀本》作爲“門徑”的功能。

沈德潛論詩，強調溫柔敦厚，所謂“詩之爲教，不外孔子教小子教伯魚數言，而其立言，一歸於溫柔敦厚，無古今一也”（《國朝詩別裁集·凡例》），“溫柔敦厚，斯爲極則”（《說詩碎語》）。故其選詩，首論詩歌宗旨，頗重雅正平和，“既審其宗旨，復觀其體裁，徐諷其音節，未嘗立異，不求苟同，大約去淫濫以歸雅正，于古人所雲微而婉、和而莊者，庶幾合一焉”（《唐詩別裁集序》），“詩雖未備，要藉以扶掖雅正，使人知唐詩中有‘鯨魚碧海’、‘巨刃摩天’之觀，未必不由乎此。至於詩教之尊，可以和性情、厚仁論、匡政治、感神明，以及作詩之先審宗旨，繼論體裁，繼論章節，繼論神韻，而一歸於中正和平”（《重定唐詩別裁集序》），“凡一千二百餘篇，皆深造渾厚，和平淵雅，合於言誌永言之旨，而雷同沿襲、浮體謠靡，凡無當於美刺者屏焉”（《明詩別裁集序》）。

沈氏論文，亦重溫柔敦厚，故對八家之文時有斥責，“然如昌黎上書時相，不無躁急；柳州論封建，挾私意窺測聖人；廬陵彈狄青，以過激沒其忠愛，老泉雜於霸術；東坡論用兵，穎濱論理財，前後發議，自相違背；而南豐、半山於揚雄之仕莽，一以爲合於箕子之明夷，一以爲得乎聖人無可無不可之至意，此尤繆戾之顯然者”（《唐宋八家文讀本序》）。

沈氏論文，以文章爲道德、功業之余事，“文發于道德、功業之餘，讀公文當自治其心，以成功業”（《重刻司馬文正公文集序》），以爲讀書行文固當輔時濟物。“從來君子立言貴乎言與行合，未可徒工于言，只自命爲文人也。蓋其發之乎言者，一本於平日讀書窮理之功，初不必艱深其旨，塗澤其辭，而析天人，明倫紀，和平通達之中使人可愛可敬而知爲正人君子，故際時之常則輔君澤民而兼善天下，遭時之變則致命遂誌而不惜一身”（《重刻黃陶庵全集序》）。故其衡文，首重作品價值趨嚮，和平通達之中有助於教化，自是文之上乘。在《原道》一文評語中，他首先闡發了自己理想中最完美的文章，那就是“本布帛菽粟之理，發日星河岳之文，振筆直書，忽擒忽縱。董之醇粹，運之以賈之雄奇”。

因此，在選篇中，沈德潛尤爲看重文章的實用價值，如其《凡例》所言“上書、表奏、劄子學者他日拜獻之具，而碑版、墓表、墓誌特備作史者搜討採擇者，不可不講求於平日，故韓、歐、王、蘇諸大篇選擇增入”。《讀本》三百八十篇文章中，奏議、論辯與碑誌三類作品分別錄入了四十九、八十七與四十五篇，接近選篇的二分之一，尤其是蘇軾、王安石的萬言書，更是全篇錄入。

在具體作品的品評中，沈氏也時時刻刻注重挖掘文章輔時濟物與闡發義理的功能，如《送殷員外序》評云“通知時事，自然知輕重，而總由於學有經術，立言有體。正使爲宗正少卿李孝誠，殷侑其副也。是役，侑以言折可汗無禮，虜憚其言。可謂不辱君命”，《送區冊序》評云“處極窮之境，而能不顧險阻，以後輩禮定交世外，真能遺外勢利，求得於《詩》《書》仁義之說者也。前鋪敘窮境，鑄鑠造化，筆筆有神”，不免對文章的藝術性有所忽略。

沈氏避俗求新，不欲與人苟同，以爲“文不嫌於熟，然太熟而薄，則不能味美於回。昌黎如《與張僕射書》《與李秀才書》《送何堅序》之類，廬陵如《醉翁亭記》，東坡如《喜雨亭記》之類，編中汰之，嫌其熟，實嫌其薄也。若昌黎《上於襄陽書》、後二次《上宰相書》《與陳給事書》《代張籍與李浙東書》之類，此又因其摧挫浩然之氣，當分別觀之”。不過，《醉翁亭記》《喜雨亭記》終是千古名篇，遺漏不得。而韓愈三上宰相書，取其第一書而不選第三書，總有酸腐習氣。

由於沈氏《讀本》巖而整，簡而明，獨樹一幟，故一經刊行，就頗為風行，尤其在海外影響極大。日本著名學者佐藤一郎，在《中國文章論》一書中曾經說過：“我們日本人，大多是從江戶時代以來通過《唐詩選》《唐宋八家文讀本》來接觸中國的名詩、名文的。”在日本本土所翻刻纂評的諸多《唐宋八家文讀本》中，影響頗大的，除賴山陽《增評唐宋八家文讀本》之外，就有川上廣樹的《點注唐宋八家文讀本》。

川上廣樹生於天寶九年(1838年)，卒於明治二十八年(1895年)，自述為朽木縣士族，下野國足利郡小膜村人，一生主要致力於鄉土教育，另著有《足利學校事跡考》。其《點注唐宋八家文讀本》付梓於明治十一年(1878年)，即光緒四年。卷首有大清首任駐日公使何如璋(1838～1891)和日本啟蒙思想家中邨正直(1832～1891)所寫之序。何氏以為讀本的意義有三：一則可以作為童蒙學習古文的範本；二則可以作為研究聖人之道的階梯；三則有助於維新事業的傳播。中邨正直別名敬字，江戶人，他在序中簡述了八家的政治生涯，指出文章與政治事業始終是緊緊聯繫在一起的，亦即學八家之文，不能徒為其文辭所吸引，更要深究其良苦用心。

川上廣樹《點注本》的價值，今天看來，除體現在作為門徑而遍及全書的鉤畫圈點之外，更展示在來自中、日名家的大量點評。日方的評語，主要取自狄生徂徠(1666～1728)、伊藤東涯(1670～1736)、中井履軒(1732～1817)、釋大典(1719～1801)、皆川淇園(1734～1807)、賴山陽(1780～1832)、齋藤拙堂(1797～1865)、海保漁邨(1798～1866)、長野豐山(1873～1837)、嶋田篁村(1838～1898)等人。中方的評語，則取自朱熹(晦庵，1130～1200)、呂祖謙(東萊，1137～1181)、謝枋得(疊山，1226～1289)、何孟春(1474～1536)、鄒守益(東郭，1491～1562)、唐順之(荊川，1507～1561)、茅坤(鹿門，1512～1601)、金人瑞(聖嘆，1608～1661)、林雲銘(西仲，1628～1697)、呂留良(晚村，1629～1683)、儲欣(同人，1631～1706)、吳乘權(楚材，1655～1719)、汪份(武曹，1655～1721)、浦起龍(二田，1679～1762)、唐德宜(介軒，清崑山人)、過珙(商侯，清無錫人)等。其纂評之豐富，是歷來古文選本所極其罕見的。

是書所引諸家評語，以日本著名學者賴山陽為最。賴山陽名襄，字子成，號山陽，日本大阪人，著述頗豐。其評點《唐宋八家文讀本》始於1822年之冬，終於次年春，所成之《增評唐宋八家文讀本》影響甚大。一時和刻八家選本，多以賴氏評點為主，《點注唐宋八家文讀本》之外，岡三慶的《唐宋八家文法明辨》和片山勤的《唐宋八大家文格纂評》也是如此。因唯其所引賴山陽評語極

多，故《點注唐宋八家文讀本》常能彌補《增評唐宋八家文讀本》之不足。如其評韓愈《爭臣論》“急言竭論，以緩勢受之。二‘矣’字，宜冷聲讀”；評柳宗元《興州江運記》“勝《饗軍堂記》，然使昌黎爲之，更有佳處”；評柳宗元《零陵三亭記》“‘清風’、‘翠煙’二語稚弱，此文大疵也。沈評乃專稱之，不可解也”；評柳宗元《至小邱小石潭記》“結處感愴欲絕。柳文結法，莫妙於此”；評柳宗元《童區寄傳》“‘我區氏兒也’，他人不必敘此言，文必索然也”等。

另賴山陽《增評唐宋八家文讀本》評語脫誤者，也可據此本校正。如評歐陽脩《胡先生墓表》脫落“皆取之用之，不能易一字也”兩句；評蘇軾《代張方平諫用兵書》“以‘然’字轉言獻言之難，而顧篇首勝”，補足“者禍大意”四字；評蘇軾《無沮山》“如僚手弄丸，愈多愈妙。與《壅蔽篇》同”，補足“有法無法處”；評《潮州韓文公廟碑》“能不能”後補足“三”字；評蘇轍《陳州爲張安道論時事書》“是談者以謂是議論”，改爲“使讀者以不謂是議論”；評《範貫之奏議集序》雲“魯公此記”，校爲“魯公祠堂記”等。至於其他字句舛誤依據《點注唐宋八家文讀本》校正者，可參加《增評唐宋八家文讀本·點校說明》（閔澤平整理，崇文書局2010年7月版）。

此次整理，以日本早稻田大學圖書館柳田文庫所藏明治十八年刊《點注唐宋八家文讀本》（弦卷七十郎出版）爲底本。所選錄之八大家原文，參校於各家文集通行本；沈德潛文中夾評與文末總評，參校於沈氏家刻本；所引諸家評語扞格難通者，參校於各家評註本及其文話，如《晚村先生八家古文精選》《拙堂文話》等。其語意難以疏通之處，往往徑改並加以注釋說明；其異文在兩可之間，且可與通行本並存者，一般在注釋中說明通行本之言辭。

《唐宋八家文讀本》曾經作爲日人學習漢文的重要指南，方今文化自信正逐步確立，此類著作的價值理應得到重新評估。

此書獲浙江海洋大學學術出版資助。

魯林華

二零一八年二月五日

序

沈確士先生所選《唐宋八家文》，流傳東國，徂徠、山陽諸儒爲之評。近學校既開，盛行於時，江戶之士請敘其簡端。夫聖人之道，自格至誠、正，至脩、齊、治、平，內根於心意，外發於言行，而道非文不著。故孔子之教門人，先孝弟而後學文。及論四教，則文冠行、忠、信之首。於戲！文以載道，其用闕矣。上古之文渾噩精奇，中古之文汪洋廣大，然其所以能致此者，根柢學術，原本經籍。故發爲文章，譬如日星河嶽，光燿氣象，亙古不可磨滅。唐宋以還，昌黎其較著者也。後學不達，離道言文，則其識不免於卑靡，其語不免於詖遁，而文亦鄙薄不足觀矣。方今東方人文蔚起，有誌於學，其取是《選》以爲童蒙之軌範也固宜。由是而研究四書六經，以求聖人之道，則用之政治可以致君堯舜，退而爲文亦必高深爾雅，足以爲維新之盛事。余雖賓使，亦有厚望焉。

大清光緒四年戊寅秋，七月嶺南

何如璋序於芝山使館

序

事業文章，一以貫之，唐宋八大家皆然。按韓爲監察御史時，上疏極論宮市，貶陽山令，有愛在民。憲宗將平蔡，御史中丞裴度具言賊可滅，與宰相議不合。韓爲中書舍人，亦言淮西必敗。及度以宰相節度彰義軍，宣慰淮西，奏韓行軍司馬。韓乘遽先入汴，說韓弘使協力。淮西平，遷刑部侍郎。憲宗迎佛骨入禁中，韓上表極諫。憲宗大怒，貶潮州刺史，移袁州，有政績。鎮州亂，殺田弘正而立王庭湊。韓爲兵部侍郎，詔韓行宣撫。衆皆危之，穆宗亦詔無必入。韓遂疾馳入，以言語屈庭湊，使息叛謀。天子悅，轉吏部侍郎，卒贈禮部尚書。其灼灼大節，有如此者。

按柳貞元時爲監察御史里行，善王叔文，擢禮部員外郎，欲大進用。俄而叔文敗，貶邵州刺史。元和時，徙柳州，設方計，贖奴婢，其爲政仁矣。柳少時嗜進，謂功業可就，既坐廢，遂不振，蓋命之窮也，非其才之罪也。

按歐召試學士院，遷鎮南軍節度使掌書記、館閣校勘。及范仲淹貶知饒州，諫官高若訥獨不言，歐遺書責之，坐謫夷陵令。仁宗用天下名士，召歐知諫院。未幾，拜右正言，知制誥。會保州兵叛，歐出爲河北都轉運使。後爲翰林學士，判太常寺，復爲諫議大夫，判尚書禮部。未幾，參知政事。最後爲觀文殿學士，太子少師。歐立朝讜直不回，身任衆怨，屢困蹶而不改其操。學者求見，與語未嘗及文章，惟談吏事。此足見其誌之所存矣。

按三蘇獨老泉脩禮書，爲《太常因革禮》一百卷，此外無事可見。然誌存經綸，念切民物，非徒弄筆翰者比也。子瞻自爲舉子，至出入侍從，必以愛君爲本，挺挺大節，每爲小人所忌惡。知杭州時，饑、疫並作，治之有法。浚二河，完六井，築湖隄，民多便之，家有畫像，飲食必祝，作生祠云。子由始官屬三司條例，爭青苗法。元祐時，歷右司諫、起居郎、舍人、戶部侍郎等官，代子瞻爲翰林學士，尋權吏部尚書，使契丹，還爲御史中丞。會調停之說起，子由

上疏，斥其非，遂已。爲門下侍郎時，西邊騷然，子由極論帥臣生事，用兵非直。後蔡京當國，致仕，不復與人相見，以至於歿。生平愛君，知無不言，酷肖其兄。

按曾經太平司法參軍、館閣校勘、集賢校理、實錄檢討官，通判越州，轉知齊州，徙襄州及洪州，加直龍圖，知福州，後徙明、亳、滄三州，皆有政績。饑歲，諭富人出糶，貸民種糧，隨秋賦納。爲洪州時，王師萬人徵安南，先期區畫供頓，迄過市里不知。官至中書舍人而卒。其政事之才，豈多讓文章哉！

按王仕至宰輔，行新法，以是毒天下。然此非獨王之罪，當時激成之者，亦不得不分任其咎。要之，王亦一代人豪，非區區之文墨之士也。

由是觀之，文章事業，嘗有二致哉！若夫論八家之外，漢則晁錯、賈誼，唐則魏徵、陸贄，宋則韓、范、司馬，明則劉基、王伯安，其最表之者也。後之學文者，苟能於是致思，則庶乎其不誤於所嚮矣。《點注唐宋八家文讀本》刻成，因序以是言。

明治十一年七月十三日，江戸，敬宇中邨正直撰

序

唐宋八家文，始於茅氏鹿門撰次，後儲氏同人病其疏漏，因增益之，倍有加矣。予賦性譚陋，少時誦習只十之三、四。年既長，亦嘗綜覽兩家選本並八家全文，而精神貫注，仍在少時誦習者。既因門弟子請，出嚮時讀本，粗加點定，俾讀者視爲入門軌塗，誌發軔也。

或謂八家之文，果皆以言載道、有醇無駁者乎？應之曰：文之與道爲一者，理則天人性命，倫則君臣父子，治則禮樂刑政。欲稍損益而不得者，六經、四子是也；後此，宋五子庶能表章之；餘如賈、董、匡、劉、馬、班，猶且醇駁相參，奈何於唐宋八家逆求其備乎？今就八家言之，固多因事立言、因文見道者，然如昌黎上書時相，不無躁急；柳州論封建，挾私意窺測聖人；廬陵彈狄青，以過激沒其忠愛，老泉雜於霸術；東坡論用兵，穎濱論理財，前後發議，自相違背；而南豐、半山於揚雄之仕莽，一以爲合於箕子之明夷，一以爲得乎聖人無可無不可之至意，此尤繆戾之顯然者。然則八家之文，亦醇駁參焉者也。

或謂如子言，後之學者，唯應於宋五子書是求，而乃問塗於唐宋八家之文，則何也？應之曰：宋五子書，秋實也；唐宋八家之文，春華也。天下無驚春華而棄秋實者，亦即無舍春華而求秋實者。惟從事於韓、柳以下之文而熟復焉，而深造焉，將怪怪奇奇、渾涵變化，與夫紆餘深厚、清峭遁折，悉融會於一心一手之間，以是上窺賈、董、匡、劉、馬、班，幾可縱橫貫穿而摩其壘者。夫而後去華就實，歸根返約，宋五子之學行且徐驅而轡其庭矣。若舍華就實，而徒敝敝焉約取夫樸學之指歸，窮其流弊，恐有等於獸皮之鞞者。吾未見獸皮之鞞，或賢於虛車之飾者也。

文刪存三十卷，鉤畫點讀，稍分眉目。初學者熟讀深思，有得於心，由此以覽茅氏、儲氏所葺，並窺八家全文，更有曠然心目間者。治經義者，有得於此；治古文者，亦未必不有得於此。外此，唐則有李習之、杜牧之、孫可之，宋則有李泰伯、司馬文正公、王梅溪、陳同甫、文信國諸公文，俱當蒐討畋漁者，學者尚究心焉。

乾隆十五年，歲次庚午仲冬月，長洲後學沈德潛撰

凡例十則

一、昌黎出入孟子，陶熔司馬子長，六朝後故爲文字中興。維時雄深雅健、力與之角者，柳州也。廬陵得力昌黎，上窺孟子。老泉之才，橫矯如龍蛇。東坡之才大，一瀉千里，純以氣勝。穎濱淳蓄淵涵。南豐深湛經術，又一變矣。要皆正人君子，維持文運。半山之文，純粹、狠戾互見，芟而存之，勿以人廢言可也。讀八家，如見其學問、心術，並其所際之時事推論之，方不膚泛。

二、賦爲古詩之流，主文譎諫，卒歸於正。然既爲韻語，則與散體文自別。雖前人選本有采入者，茲仍舍旃，論體裁也。

三、是編爲初學者讀本，故概從其簡，且半屬家塾中誦習者。第上書、表奏、劄子，學者他日拜獻之具，而碑版、墓表、墓誌，特備作史者搜討采擇者，不可不講求於平日。故韓、歐、王、蘇諸大篇選擇增入，誌古者宜究心焉。

四、文中事有關係者，每考諸史傳，旁及諸文籍記載。或錄爲總評，或列於旁批，俾讀者兩相證印，亦尚友古人之一助焉。若稗官野乘，不敢泛入。

五、文有評點以清眉目，有勾乙截住，段落井然。然必窺其立言之意，與前後提掇照應、往來順逆、斷續離合諸法，本文中固有者一爲指畫，非敢取古人之文強就臆說也。且恐覲縷紛紜，轉歧學者心目，故語從其簡。

六、前人評論，故宜采入。然必議論精當，有知人論世之識者，始搜擇之，無容誇多鬥靡也。至於徵引典故，語屬艱深，及關切時事有待考核者，亦注釋一二。若人人意中語，胥從闕如。

七、文不嫌於熟，然太熟而薄，則不能味美於回。昌黎如《與張僕射書》《與李秀才書》《送何堅序》之類，廬陵如《醉翁亭記》，東坡如《喜雨亭記》之類，編中汰之，嫌其熟，實嫌其薄也。若昌黎《上于襄陽書》、後二次《上宰相書》《與陳給事書》《代張籍與李浙東書》之類，此又因其摧挫浩然之氣，當分別觀之。